

足音

中国考古经过百余年发展,已构建起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无数考古人见证、推动这一事业,从筚路蓝缕走上规范化发展之路,前不久离开我们的考古学家黄景略是其中的代表。

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开启依法保护管理文物的新征程,黄景略作为文物工作者代表参加了条文的制订。改革开放后,如何健全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考古法律体系成为萦绕他心头的大事。

1983年2月4日,文化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首先确定和完善了发掘单位资质、发掘项目申请与考古发掘工作执照制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季是这两个文件出台的亲历者。当时他和几位年轻同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在黄景略这个“考古大管家”的手下准备大展宏图。几个年轻人看到各地报来的考古工作申请书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格式,觉得应当推动考古申报规范化,于是制作了固定格式的申请单,专门设计了考古发掘证照。“现在想一想,没有黄先生的支持,这些工作不可能进展得这么顺利。”李季说。

上世纪30年代出生于福建惠安的黄景略,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6年毕业后进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长年奔波在各大考古现场,参与或主持河南洛阳东周城、河北燕下都、山西侯马晋国、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湖北江陵楚纪南故城等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1960年到1963年底,他来到山西支援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并任副队长。侯马工作站因1952年发现的侯马晋国遗址的重要发现和配合基建考古的长期性而设,被誉为“新中国考古第一站”,是当时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田野考古工地。有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田野考古工作,为了统一认识,黄景略拟定田野发掘的要求、步骤、记录的格式,作为工作规程发给每个人,这些成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雏形。

1984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夏鼐等提出要重视考古发掘质量,制定“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被列为会议重要议题。制定工作由黄景略主持,参加讨论的都是在一二线工作的各省考古所所长,张忠培、严文明、俞伟超等考古学家陆续加入。大家各抒己见,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李季说:“会议结束后,我们从成都到重庆,从重庆坐船到宜昌,一路都在讨论具体章节。那条船很简陋,大家就在船上废寝忘食地讨论。当船驶到终点宜昌时,《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框架与内容也就差不多了。”1984年5月10日,文化部发布《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内容涉及考古调查与考古勘探、遗址与墓葬发掘、发掘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编写等一条龙的内容。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第一部科学技术标准,长时间规范着田野考古工作。

黄景略适时参与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1989年10月20日,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及时制定水下文物保护行政法规,为我国维护水下文物主权和安全,开展水下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提供了重要法规保障。199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颁发实施,确立了涉外考古工作基本原则。1990年4月20日,国家文物局颁发《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加强了考古经费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

1984年9月起,黄景略和张志培、严文明等一起举办了6期田野考古工作领队培训班。黄景略身体力行指导田野考古,他常说:“不怕挖错,只怕不知挖错,错在什么地方。”为人随和的他,在考古现场一丝不苟、格外认真,每个领队都很忐忑,生怕自己答不上黄景略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人才培养,共培训学员140余人,形成了一支本领过硬的考古“铁军”,不但有效缓解了当时领队人才青黄不接的窘迫,更重要的是传承了吃苦耐劳、重在实践的良好学风。

黄景略是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重要组织者。他推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指导和参与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和管理、考古工地和文物保护单位工程检查等,推进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说,最开心的是看到中国考古事业厚积薄发、后继有人。如今,一大批优秀考古人才开始挑大梁,接续奋斗在中国考古的广阔田野。

闻白

从“文明曙光”到“红山古国”

牛河梁遗址考古新发现新收获

郭明 贾笑冰

“象征中华文明曙光应当是恰如其分的”。牛河梁遗址第二阶段考古工作开始于2017年,工作区域为“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这是遗址结构、功能较为特殊的区域,也是认识牛河梁遗址的重要切入点。新的考古发现将第一地点重新划分为9座营建顺序略有先后、功能密切相关的台基构成的大型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女神庙”坐落在规模宏大的台基之上,目前该台基的残存高度达4.6米以上。考古显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并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兴建的台基建筑群,凸显了红山社会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由北高南低的3座台基建筑构成。9号台基以夯土为主,5号、6号台基采用土石混筑,台基外侧的导排水设施在保证地势较高的5号、6号台基排水的同时,保护了9号台基及其上的“女神庙”。3座台基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在对环境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统一规划设计、功能密切相关的建筑群。

缺乏与生活居住相关的聚落遗址信息,是红山文化考古工作中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第一地点的考古发现提示我们,在尚未发现与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相关的证据时,公共设施的营建可以为认识红山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供新视角。第一地点的9座台基建筑皆土石混筑,尽管最大限度利用了区域的自然地势,但运输各类材料、垫平相对低洼区域、构筑平台,依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意味着,红山文化已经出现足以支撑大型社会公共设施营建与维护的丰富物资储备。从中,可以窥见红山社会物质生产的繁荣。

红山文化从中期开始规划、设计、营建礼仪中心,形成礼仪体系

第一地点的考古,发现了与文献记载的燎祭、瘞埋和裸礼活动相对应的祭祀遗迹,表明这一时期的红山社会已经形成祭祀天、地、祖先的规范,出现与文献记载相似的祭祀礼仪体系。这一祭祀礼仪规范在不同规模的遗址都有体现,说明它已经走出牛河梁遗址,为红山社会所普遍接受。

唯玉为葬是牛河梁遗址最早发现的墓葬特征。随葬玉器是判断墓主身份地位的主要依据,出土玉器最为精美的墓葬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特征。这里考古发现的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使用规律并不明晰,若将视野扩展到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可以发现较为明确的玉器使用规范。在距离牛河梁遗址150公里的胡头沟遗址,发现了与牛河梁遗址相同



高等级墓葬,以及更为复杂的墓地布局规律。比较两地随葬玉器可以发现,相同造型器物在体量与质地上存在差异,牛河梁遗址玉器体量更大、玉质更润泽。玉器特征的差异与《周礼》等文献中所记载的不同等级个体在玉器使用方面的规范相同。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礼器的功能。

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红山文化是最早参与到一体化进程中的古国文明之一。红山文化从中期开始规划、设计、营建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积石冢形成的用玉制度,开中国玉礼器、玉礼制之先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祭司作为媒介、沟通天地的基本结构,也是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蓝本。

红山文化的新因素、新特征、新发展是对周边优秀文化吸收与融合的成果

陶器是人类留下的最有代表性的密码之一。采用科学方法对红山先民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时人类活动的某些特点。在牛河梁遗址大型积石冢上,往往摆放有数百个陶筒形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样集中生产大量陶器只能是群体劳动

的结果。制作者仅对陶筒形器外部进行了精心加工,器身内部只作简单处理。新出现的器形延续了筒形罐上常见的之字纹,并在陶器表面将纹饰分段布局。彩陶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纹饰的表现方式。红地黑彩,是红山文化彩陶典型的特征。先画出纹饰的线条,再以黑彩填充,与赵宝沟文化几何纹内以斜线或之字纹填充的纹饰表现方式异曲同工。虽然新出现的文化因素有独特的发展脉络,但共同构成了红山文化的特征要素。

红山文化的玉器也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特征。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玉器群,以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玉环为主体,并包含有仿生造型的玉器,是将流行于小南山文化的玉璧、辽西区较早流行的环状玉器以及仿生造型传统加以整合的结果。

红山文化到红山文明的嬗变,其源头与根基首先是对辽西区域本地传统的承继,聚落模式、陶器器型与纹饰、用玉习俗,无不体现出文化现象背后的宇宙观、世界观的连续性。

创新性突破也随之而来。仪式空间从逼仄的个体空间变为专用大型公共空间,陶器器型变得丰富且开始使用彩陶技术,玉器也不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等级的礼器。红山文化的新因素、新特征、新发展是对周边优秀文化吸收



与融合的成果,而这种文化之间主动的交流与融合需要足够的包容性。

新的考古发现从制度文明等角度,为红山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直系提供新的注脚。

(作者为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领队)

图①: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出土的玉器。图②: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图③: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带盖彩陶瓮。以上图片均为郭明提供 版式设计:沈亦伶

考古中国

核心阅读

一系列考古发现奠定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从“文明曙光”到“红山古国”,考古发现不断推进对牛河梁遗址乃至红山文化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2020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西辽河流域的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是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的29处核心遗址之一。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5800年至3800年前后的古国时代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为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大型台基建筑群的新发现和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等级分化,进一步细化了人们对古国时代演进特色的认识。

从“文明曙光”到“红山古国”,考古发现不断推进对牛河梁遗址乃至红山文化的认识。

考古显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并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兴建的台基建筑群,凸显了红山社会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已知规模最大、由多个遗址点构成的遗址群,其考古工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坛庙冢”为代表的遗迹、精美玉器表现出的“玉礼制”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奠定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撰文评价称,红山文

匠心独运

夹江竹纸,匠心妙手传千年

李凯旋



夹江工匠在制作竹纸。夹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夏雨连绵,起伏的丘陵间雾气弥漫。当地盛产竹子,有风吹拂,雾中竹枝摇曳,配上暗沉的天色,犹如一幅水墨画。

行至马村镇状元纸坊,坊前高大的篁锅刚烧热。工人们手脚麻利,将处理过的嫩竹放入锅中蒸煮,它们很快就会成为造纸的原料。

夹江享有“蜀纸之乡”的美称,竹纸在这里沿袭了千年。当地自唐代使用竹料造纸,竹纸制作技艺兴于明,盛于清。夹江竹纸与安徽宣纸齐名,曾被国画大师张大千誉为“国之二宝”。2006年,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遵循古法,一张竹纸要3个多月才能完成。夹江县清代道光年间的《蔡翁碑叙》将竹纸工艺概括为“砍其麻、去其青、渍其灰、煮以火、洗以水、舂以臼、抄以帘、刷以壁”24个字。“从选料到成纸,要经历15个环节,工序多达72道。”状元书画纸厂厂长陈秀君说。

状元纸坊依然保留完整的72道竹纸制作工序。纸坊所在的老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下层造纸、上层住家,一家人代代以纸为生。陈秀君的公公杨占尧是竹纸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她随老人学习造纸技艺,如今是杨家手工造纸的第十三代传人。

“熟练掌握所有工序,是成为传承人的基础。”陈秀君专注竹纸30年,习惯了整日待在生产现场与工人们讨教。“每道工序有各自的诀窍,以蒸煮为例,篁锅的火候、用水量都不好掌握;在去水后的纸堆上将一张张纸分开,用的也是巧劲,稍有不慎便把纸损坏了。”谈起造纸,陈秀君打开话匣子。

诸多工序中,抄纸是最难的一环。工人将竹帘放入纸槽再拿起,其上就有了流淌的纸浆,此时必须轻轻晃动,使纤维均匀分布,多余的水分自然流失,纤维方能交织成纸。“这个过

程要做到心手合一,用力均衡。技艺精湛的老师傅甚至能做到抄出的每张纸厚度近乎相同。”每道工序陈秀君都耐心磨砺。

今年,陈秀君成功入选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机器纸成本低、产量大,市场对手工纸的需求一再下降,年轻人中有兴趣学习竹纸制作的更是少之又少。在产业发展、文化传播方向转型,是夹江竹纸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陈秀君的压力所在。

杨湾纸坊装潢古色古香,墙壁刷成纸浆色,整个建筑犹如被洁白的竹纸包裹着。生产厂房宽敞明亮,工人熟练地抄纸,纸堆叠得工整,像一个个“豆腐块”。楼上木板架排列整齐,工人小心翼翼地将湿纸刷在板上,静待晾干。这里年产手工纸5万余刀。

杨湾纸坊创建者杨雨今年35岁,是土生土长的夹江人。过去,夹江竹纸做在作坊,卖在作坊,销路打不开。如今,乘着电商发展的春风,他把竹纸带进直播间。组建专业团队直播带货,在各大网络平台运营账号、积累粉丝,杨雨的书画纸品牌每年能从电商平台接到上百万个订单。

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在杨湾纸坊展厅,新产品琳琅满目。“雁皮纸”美如丝绸,润而不漏,适用于国画创作。“蝉翼毛边”薄如蝉翼,细腻柔滑,是拓片拓碑的佳选。“根据书画从业者的需求,我们还会用青苔、龙须草等材料做纸,实现手工纸的定制化。一刀高品质的竹纸能卖到900元。”杨雨告诉我,纸坊还

开发了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同样热销。

蝉鸣阵阵,童声朗朗,暑假刚至,大千纸故里研学园热闹起来。搬小板凳坐好,学生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夹江竹纸制作,亲手抄捞纸张。如有兴趣,还能在自己制作的纸上题字作画。见学生们踊跃参与,园区负责人王祥兵很欣慰:“纸张承载着历史,亲身参与造纸过程,孩子们更能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2019年大千纸故里研学园开园,设有古法造纸陈列馆、汉文化体验馆、古法造纸体验馆、年画拓印装裱体验馆等区域,是夹江竹纸制作技艺研学的主要基地。

“要把夹江竹纸传出去,让技艺活起来,就得在课程设计上用心,研学一定不能走马观花。”王祥兵告诉我,园区联合非遗传承人与研学课程团队,把课程做得细致、有亮点,开发了“抄捞纸张”“手工花草纸”“夹江年画”等多门研学课程。“我们正计划将夹江竹纸制作技艺做成动画插入课程,方便孩子们理解和记忆。”王祥兵说。

这两年,来到状元纸坊参观研学的人也多起来。“多的时候,一年要接待超过3万人。”陈秀君亲自上阵演示,还做了调查问卷收集建议,“多拿出造纸的劲头来做好研学。”

“没想到我也可以亲手做出竹纸,这次研学经历令人难忘。”翻看孩子们的留言,稚嫩的字迹中饱含对传统文化的赞叹。陈秀君相信,夹江传承千年的竹纸香气,一定会愈发浓厚。